

敦煌變文名物研究

張春秀◎著

掛榜山文集
總主编◎王志明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玉林師範學院高層次人才科研啟動基金”資助項目

敦煌變文名物研究

張春秀◎著

掛榜山文集
總主编◎王志明

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敦煌變文名物研究 / 张春秀著 . — 成都 :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2015.7
(挂榜山文集)
ISBN 978-7-5643-4040-7

I . ①敦 … II . ①张 … III . ①敦煌学 - 变文 - 文学研究 IV .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2015 号

挂榜山文集

敦煌變文名物研究

张春秀 著

责任编辑 张慧敏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印张 14.5 字数 259千

成品尺寸 170 mm × 240 mm

版本 2015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5年7月第1次

印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书号： ISBN 978-7-5643-4040-7

出版 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地址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46号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定价： 5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總序

掛榜山，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東南部的玉林市，是玉林八景之一。《郁林州志》詩卷收載了清朝乾隆學政許其源所作的《合賦郁林八景》：“石室仙蹤在鬱州，寒山應雨任君求。龍泉湧出流霞水，水月岩虛射鬥牛。白石洞天仙子至，南橋古渡鯉魚遊。西甌池內蛟龍現，掛榜山崩應六秋。”這首詩說明：一是玉林市歷來就有舞文弄墨的傳統；二是掛榜山很早以前就是文人墨客歌詠的物件。玉林師範學院緊傍掛榜山，無形中就增添了很多詩意。古來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掛榜山與天南湖相互映襯，一起涵養著玉林師範學院的人文風景，《掛榜山文集》正是這風景全豹之一斑。

中文系是玉林師範學院歷史最悠久的系部，半個多世紀以來為廣西培養了大量的語文基礎教育師資。為更好地優化教學資源，培養更多“下得去、留得住、有作為”的優秀人才，2011年中文系將原有的漢語言文學、現代文秘、廣播電視新聞學、廣告學、對外漢語等五個專業合併在一起，成立玉林師範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以下簡稱文傳院）。目標是把學院建設成為“讓學生自信、家長放心、教師樂業、社會認可”的教學單位，要實現這樣的目標，任重而道遠。為此，學院積極實施“四大工程”（教授、博士領航工程，中青年教師能力提升工程，學科建設與院工程和學風教風建設工程），積極探索“五育人”策略（文化育人、學術育人、實踐育人、技能育人、管理育人），並根據專業特點和經濟社會對應用型人才的需要，積極建設“四支隊伍”（文秘公關隊伍、新聞傳播隊伍、文學創作隊伍、廣告策劃隊伍）。現在，各項工作穩步推進，並取得明顯效果。《掛榜山文集》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產生的。

該系列叢書包括教師專著、學生專著、學生作品集。

教師專著方面，主要出版教學一線教師的個人創作。教師教學水準決定著一個學校人才培養能力的高低，而將教學實踐提升為理論則是對大學老師的更高要求。文傳院有一批會教、能寫、善做的優秀教師，特別是近些年高職稱高學歷人才的培養和引進，使得文傳院的教學水準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請這些老師把自己的教學經驗和成長過程收集整理出來，由學院統一公開出版，是一件可以產生後光效應的好事，可謂一舉三得：一是可以鞏固教學成果，二是可以激勵教師進步，三是能夠樹立學生信心。

學生專著方面，主要出版在校學生的個人創作。學生是學校的名片，衡量學校教學效果的指標不是有多少設備和蓋多少大樓，而是看這個學校能否培養出對社會有用的人才。西南聯大在非常艱苦的環境下培養出了新中國建設的中堅力量，成為中國高等教育史上迄今為止無法超越的豐碑。文傳院地處偏遠，雖無爭名奪利之心，但有建功立業之志。我們培養的學生立足桂東南，面向全廣西，輻射全國。當前，由於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我們的學生缺乏更高遠的眼光和頑強拼搏的勇氣，個人能不能夠得到全方位的發揮和施展。借助《掛榜山文集》的出版，希望拔尖人才能夠脫穎而出，樹立榜樣帶動更多的學生積極進取。

學生作品集方面，主要出版各種比賽中的優秀作品。一枝獨秀不成林，百花盛開才是春。我們組織了演講比賽、新聞大賽、徵文比賽等各種賽事，以賽促教、以賽促改、以賽促學，為儘量多的學生提供施展才能的機會。當學生看到自己的努力成果被永久保存的時候，自尊心和自信心可以得到極大的提升。一切為了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為了一切的學生，我們不會放棄任何一個正在成長的生命，我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幫助他們儘快成才。

巍峨的掛榜山，千年不倒；碧波的天南湖，百世長綠。當我們站在掛榜山上眺望未來、漫步在天南湖畔規劃人生的時候，耳邊常響起校歌那高昂的旋律：掛榜山下有一個園丁的搖籃，南流江畔有一片知識的港灣。夢想在這裡插上翅膀，青春在這裡揚起風帆。以德為先，艱苦奮鬥，我們一起從天南湖出發。啊，玉林師院，啊，玉林師院。厚德博學是你的營養，知行合一你的脊樑，你從手中接過文明的薪火，明天明天，明天明天，我們走向未來，播種陽光！

祝願《掛榜山文集》像陽光一樣普照！

王志明

2014年12月

前 言

敦煌變文是唐、五代時期人們以俗講的方式記錄佛經故事和歷史故事的一種文學體裁，是敦煌俗文學作品中份量最重、影響最大者，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和史料價值。它的發現，讓很多鏈條不太明顯甚至空白的地方串聯起來，給研究帶來了新的生機，尤其是給語言研究和文學研究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學者、專家們更是倍加勤奮和努力地整理與研究，目前已是成果累累，成績斐然。

敦煌變文的語言上承先秦兩漢的文言用語，下推宋元白話口語，是連接古代漢語與近代漢語的一座橋梁，在漢語發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敦煌變文裏含有大量的、豐富的名物，有些雖是常用詞，然考據其源流，也需下一番功夫。因此，把敦煌變文名物作為研究對象，不管是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本書主要以《敦煌變文校注》為底本，通過同義、類義系統辨考法，文獻、實物、圖像結合法，專科知識法，語言與文化結合法，選取了 133 個名物對其進行了比較詳細的考察和解釋，以期對敦煌變文的閱讀與理解、漢語詞彙史的研究、辭書的編纂與修訂作一點有益的、必要的幫助。

全書內容分為上下兩編。上編為總論，共分五部分，主要介紹了選題的緣起，分析了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及名物研究的現狀與趨勢，交待了本書所採用的材料和研究體例，結合具體例子論證了敦煌變文的研究價值和研究方法，總結了敦煌變文名物的用字特徵，最後指出了敦煌學研究的成就和敦煌變文名物考釋的難度。下編為考釋篇，共七章，分飲食類、衣飾類、器用類、舟車類、樂器類、武備類、佛具類，對敦煌變文中的名物進行了較為詳盡的梳理和考釋。

張春秀

2015 年

目 錄

上編 總論篇

緒 論	1
一、選題的緣起	1
二、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及名物研究的現狀與趨勢	2
三、本選題所採用的材料和研究體例	6
第一章 敦煌變文名物的研究價值	7
一、有助於變文的閱讀與理解	8
二、有助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	22
三、有助於辭書編纂	29
第二章 敦煌變文名物的研究方法	40
一、同義、類義系統辨考法	40
二、文獻、實物、圖像結合法	48
三、專科知識法	57
四、語言與文化結合法	64
第三章 敦煌變文名物的特徵	73
一、敦煌變文名物的用字特徵	73
二、敦煌變文名物的品類特徵	78
餘 論	79

下編 考釋篇

第四章 飲食類	81
一、飲食	81
二、食具・炊具	94

第五章 衣飾類	98
一、冠服	98
二、飾品	107
第六章 器用類	126
一、勞動工具	126
二、日常用具	136
第七章 舟車類	150
一、舟類	150
二、車馬類	152
第八章 樂器類	158
一、吹奏樂器	158
二、彈拉樂器	169
三、打擊樂器	179
第九章 武備類	187
一、軍事器具	187
二、戲要用具	196
第十章 佛具類	202
一、生活用具	202
二、供養用具	206
主要參考文獻	212
專著	212
論文	215
主要徵引文獻	218
後記	221

上編 總論篇

緒 論

一、選題的緣起

名物¹研究在我國源遠流長，歷史悠久。“上可以追溯到漢代的訓詁學，下經過明代的名義學，再發展為清代的考證的名物學。”²我國最晚自周代起就開始了名物辨識的工作，從戰國《爾雅》起，名物考釋就一脈相承：東漢劉熙《釋名》、北魏劉懲《物祖》、隋代謝昊《物始》、北宋陸佃《埤雅》、南宋羅願《爾雅翼》、明人方以智《通雅》和羅頤《物原》、清代陳元龍《格致鏡原》等。用“名物”一詞標其書名者首見北宋蔡卞等《詩學名物解》，其後有南宋方逢辰《名物蒙求》、明代耿隨朝《名物類考》和劉侗《名物考》等。隨著地下材料的發現和大量實物的出土，名物研究從“純語言”單線直向、封閉性研究的傳統模式走向了語言、文化多學科的複線交叉、開放性研究的科學軌道，從此，名物研究不再單調、乏味和循環，而是充盈著無限生命力和湧動著無限活力的一門古老而年輕

1 關於名物的定義，主要有三種說法：（1）名物是古代人們從顏色、形狀（對於人爲之器來說是指形制）、功用、質料（含有等差的因素）等角度對特定具體之物加以辨別認識的結果，是關於具體特定之物的名稱。劉興均：《〈周禮〉名物詞研究》，成都：巴蜀書社 2001 年版，第 22 頁。（2）國學傳統中所謂的“名物”，為有客體可指，關涉古代自然與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事物，其名稱亦皆為我國實有或見諸典籍記載的客體名詞，其中包括圖騰崇拜乃至歷史傳說中的客體名詞。……研究與探討名物得名由來、異名別稱、名實關係、客體淵源流變及其文化涵義之學問是為名物學。王強：《中國古代名物學初論》，見《揚州大學學報》，2004 年第 6 期，第 54 頁。（3）從所指的角度而言，名物是屬於某一物類的特定具體之物，它們都具有自己獨特的區別性特徵；從語言的角度而言，它是音義關係在約定俗成中形成、為全民所普遍接受認可的名詞或短語。它是古代人們對具體特徵之物加以辨識分類的結果。錢慧真：《〈周禮正義〉所見孫詒讓名物訓詁研究》，山東大學博士論文，2009 年，第 26 頁。由於時間和精力有限，本文所研究的敦煌變文名物僅限於具體的物類，不包括抽象的事類。名物的確定和選取採用劉興均、錢慧真的說法，即所有的名物都應該是名詞或短語。

2 [日]青木正兒：《中華名物考》（外一種），范建明，譯，中華書局 2005 年版，序言第 10 頁。

的交叉學科。

中國的小學研究一直以“名與實”作為主線，王寧在給劉興均的《〈周禮〉名物詞研究》序言中說：“名物考據是我國古代學術的一個專門題目，它的任務是對一些物類的專有名稱進行解釋。解釋一個專有名稱，必須名、實同步考察，源、流一並弄清，所以，這一課題涉及多方面的領域，是一個詞源學、訓詁學、文化學甚至科技史等學科的交叉課題，難度是比較大的。但是，它也是一個很有魅力的課題，常常於不經意之中發掘出奇異，讓人發出慨嘆。”¹但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關於中國名物學的研究國內外學術界卻較為沉寂，論文寥寥，“更沒有一部哪怕是粗略的《中國名物學》或《中國名物學史》的著作問世，這方面的理論總結及相應的文化研究相對滯後，……學術界非常有必要對數千年的中國名物學理論的形成與發展進行全面的梳理、總結和研究，以期推動中華學術文化的繁榮與發展。”²名物學研究過去是必要的，現在也是必要的。“由物，而見史、見詩，這本來是名物研究的一大優勢，因此，這一領域實在不應如此沉悶。”³

基於以上考慮，我們以《敦煌變文校注》為底本，把《敦煌變文名物研究》作為研究選題。

二、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及名物研究的現狀與趨勢

(一) 研究現狀

1. 敦煌變文語言研究現狀

自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敦煌變文被發現以來，學者們對其的整理和研究傾注了大量的精力，作了大量的工作。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 語料整理方面：《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校注》⁴等；② 詞彙研究方面：《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隋唐五代漢語研究》《敦煌文獻語言詞典》《唐五代語言詞典》⁵等，

1 劉興均：《〈周禮〉名物詞研究》，巴蜀書社 2001 年版，序第 1 頁。

2 王強：《中國古代名物學初論》，見《揚州大學學報》，2004 年第 6 期，第 53 頁。

3 揚之水：《詩經名物新證》，北京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5 頁。

4 王重民，等：《敦煌變文集》，人民文學出版社 1957 年版，潘重規：《敦煌變文集新書》，臺灣“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1983 年版。郭在貽，黃征，等：《敦煌變文集校議》，岳麓書社 1990 年版。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 1997 年版。

5 蔣禮鴻：《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增補定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 年版。程湘清：《隋唐五代漢語研究》，山東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蔣禮鴻，黃征，等：《敦煌文獻語言詞典》，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4 年版。江藍生，曹廣順：《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7 年版。

詞語考釋的單篇論文有 100 餘篇¹；③ 語音研究方面：《敦煌俗文學中的別字異文和唐五代西北方音》、《敦煌變文用韻考》、《敦煌變文用韻考》(一)(二)(三)、《敦煌變文破讀字例》、《敦煌變文假借字音義關係研究》、《敦煌變文假借字譜》、《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敦煌變文通假字中的入聲字》等；④ 語法研究方面：《敦煌變文語法研究》²，單篇論文 30 餘篇³。關於 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成果及綜述具體可參看陳明娥的《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一文和相關的專著及論文，這裏不再贅述。

21 世紀以降，據不完全統計，十多年來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出版專著共有 7 部，論文 137 篇⁴：其中期刊論文 123 篇，學位論文 14 篇。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① 詞彙研究方面：出版專著 6 部⁵，期刊論文 95 篇，學位論文 9 篇；② 語法研究方面：專著 1 部⁶，期刊論文 23 篇，學位論文 4 篇；③ 語音研究方面：期刊論文共 5 篇，學位論文 1 篇。

2. 敦煌變文名物研究現狀

敦煌變文名物的考釋散見於一些專著、詞典和論文中，具體體現如下。

(1) 專著和詞典主要有：蔣禮鴻（1959, 1997）《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第三篇單列“釋名物”一章，共有 39 個條目，另外，“釋稱謂”中也有一些條目是名物考釋；羅宗濤（1974）《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涉及敦煌名物較為全面，包括飲食、衣飾、建築、行旅、家族與奴婢、婚姻、喪紀、教育、信仰、經濟、娛樂、社交禮儀、俗諺典語、獄訟 14 個類別，每一類都匯集材料，但考證比較簡單粗略，“而其研究的結果，充其量也只能讓研究社會風俗史的學者，在變文流行時代的這一段，得到一點補充的材料而已”⁷；程湘清（1992）主編《隋唐五代漢語研究》中的《變文複音詞研究》解釋的名物有“青泥”（P.36）、“拋車”

1 陳明娥：《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見《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1 期，第 141 頁。

2 吳福祥：《敦煌變文語法研究》，岳麓書社 1996 年版。

3 陳明娥：《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1 期，第 144 頁。

4 說明：統計時間 2001-2013 年 8 月，統計範圍僅限於中國（不包括文字校勘）；使用數據庫為 H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 HCNKI 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其中詞彙 95 篇、語法 23 篇、語音 5 篇、書評 4 篇、綜述 10 篇。

5 (1) 曾良：《敦煌文獻字義通釋》，廈門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2) 陳秀蘭：《敦煌變文俗語詞溯源》，嶽麓書社 2001 年版。(3) 陳秀蘭：《敦煌變文詞彙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2 年版。

(4) 黃征：《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5) 黃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6) 陳明娥：《敦煌變文詞彙計量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6 年版。

6 吳福祥：《敦煌變文 12 種語法研究》，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4 年版。

7 羅宗濤：《敦煌變文社會風俗事物考》，臺灣“文史哲出版社”1974 年版，第 1 頁。

“香爐”、“毬場”（P.37）、“烊銅”（P.45），“撒花”（P.68），“問頭”（P.85），“阿魏”（P.96），“泥狀魚”（P.102）等，還列出了表器物、植物、動物、衣飾、處所（P.101-103）等名物；蔣禮鴻、黃征等（1994）《敦煌文獻語言詞典》全書凡條目 1526 個（其中變文詞語 1300 多個），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的基礎上不僅增加了條目，也新增了義項，是一部“迄今為止收詞最多的敦煌文獻的專門語言詞典”¹；黃征（1997）《敦煌語文叢說》服子（P.42）、翠幕（P.44）；黃征、張涌泉（1997）《敦煌變文校注》如苦苣（卷一 P.30 第 132 條註釋）、蕨葵（卷一 P.35 第 203 條註釋）、赤石（卷一 P.37 第 211 條註釋）、龍齒（卷一 P.37 第 219 條註釋）、拋車（卷一 P.53 第 426 條註釋）、生杖（卷一 P.84 第 156 條註釋）、撒花（卷一 P.116 第 236 條註釋）等；江藍生、曹廣順（1997）《唐五代語言詞典》共收詞語（包括熟語）4500 餘條，以唐五代出現和使用的口語詞、方言詞為主，也酌收一些唐五代的名物和其他方面的詞語；曾良（2001）《敦煌文獻字義通釋》收釋詞語約 300 條，內容包括三部分：釋言語、釋俗字、訛字，釋文化詞等，其中有些詞語涉及敦煌變文名物的如絆（P.12）、牞（P.91）、苦參（P.133）、青紫（P.140）等；陳秀蘭（2001）《敦煌變文俗語詞溯源》如畫瓶（P.50），苦酒（P.70）；陳秀蘭（2002）《敦煌變文詞彙研究》解釋名物 70 餘條，如三故（P.5）、艾火（P.8）、寶子（P.22, P.217）、典尺（P.37）、牛香（P.82）等；黃征（2002）《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如生杖（P.60）、碧落（P.93）、薺草（P.111）、撓勾（P.112）、軟五（P.157）、花沒鵠（P.164）、三故/金三故（P.168）等；杜朝暉（2011）《敦煌文獻名物研究》考證的敦煌變文名物如露柱（P.22-24）、納袍（P.185-187）、雙陸（P.156-162, 409-413）、生杖（P.404-405）、寶子（P.415-417）等；陳明娥（2006）《敦煌變文詞彙計量研究》如解釋了三故（P.43）、紙筆（P.60）、沉檀（P.223）、拋車（P.271, P.283）等名物意義，還列舉了很多名物如“芭蕉、葫蘆、梧桐、醍醐、傀儡”（P.177）等。

（2）論文主要有：陳秀蘭《敦煌變文詞語校釋》²，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³，姚美玲《敦煌變文詞語例釋》⁴，劉傳鴻《讀〈敦煌變文校注〉札記三

1 方一新：《近年來國內敦煌語詞校釋研究專著四種述評》，見《徐州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0 年第 2 期，第 32 頁。

2 金鈎“是一種形似劍而彎曲的器具，可以用於作戰，……也可用於農事。……今四川鄉間仍有此種器具，用於拿取高處之物。”陳秀蘭：《敦煌變文詞語校釋》，見《古漢語研究》，2002 年第 2 期，第 68 頁。

3 花臺指“佛主所坐的蓮花寶座”；“典尺”指“講經時的用具”。黑維強：《敦煌變文詞語校釋》，見《敦煌學輯刊》，2003 年第 1 期，第 103 頁、第 108 頁。

4 法座指“宣講佛法的講座”。姚美玲：《敦煌變文詞語例釋》，見《敦煌學輯刊》，2004 年第 1 期，第 69 頁。

則》¹，杜朝暉《敦煌寫卷名物類文獻對敦煌學研究的價值》²，張生漢《釋“搭索”》³，楊小平《敦煌變文疑難俗語詞考釋》⁴，楊小平《敦煌變文疑難詞語考釋》⁵等。

(二) 研究趨勢

自 19 世紀末敦煌變文被發現以來，敦煌變文詞彙研究尤其為人們熱衷，從各種校勘和校注著作對變文詞彙作出的校記和注釋，到單篇論文和詞彙專書對變文疑難詞語的考證和考釋，已經基本上掃除了人們閱讀的障礙。但我們不應該停留於此而沾沾自喜，裹足不前。從目前的研究現狀來看，變文語言還有很大的研究空間，特別是詞彙這一塊，雖說詞彙的研究開展得很早，但從總的情況來看，發展還是比較緩慢的。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 第一，注重個案的描寫和分析，對變文詞彙的系統性研究不夠；
- 第二，注重共時地靜態的考察，歷時地比較與探源性研究較弱；
- 第三，忽視某些先進的語言理論和方法，研究態度比較保守；
- 第四，語音、語法、詞彙等方面結合研究還不夠。⁶

姜亮夫在《敦煌變文校注》的序言中指出：“變文為敦煌俗文學作品中份量最重、影響最鉅者。其為宋元話本之先導，治小說史者不可不特予關注；其為六朝唐宋俗語詞之淵藪，治漢語史者不可不致心研究；而其為歷史、宗教、民俗諸學寶貴文獻，則諸學科之研治者復不得不隨時留意。”⁷敦煌變文名物研究是敦煌變文詞彙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目前目力所及，變文的名物考證僅散見於個別論文和幾本專著，這和敦煌變文詞彙研究總體上所取得的成就是不相稱的。敦煌變文裏含有大量的、豐富的名物，因此，把敦煌變文名物作為研究對象，不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1 苦苣為一物。劉傳鴻：《讀〈敦煌變文校注〉札記三則》，見《中國語文》，2006 年第 2 期，第 175 頁。

2 露柱即“烏頭門的兩木柱”；納袍即衲袍，“是飾有刺繡花紋的高級袍服。”杜朝暉：《敦煌寫卷名物類文獻對敦煌學研究的價值》，見《中國典籍與文化》，2009 年第 2 期，第 14-16 頁。

3 “搭索”是一端結圈，拋擲出去，用以套人或馬的繩索，即後來的“套索”“套馬索”，與“搭鈎”不是一物。張生漢：《釋“搭索”》，見《漢語言文學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10 頁。

4 箩箕，竹編盛物器。楊小平：《敦煌變文疑難俗語詞考釋》，見《宗教學研究》，2010 年第 1 期，第 87 頁。

5 生杖，繩索、鐵索。楊小平：《敦煌變文疑難詞語考釋》，西華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2 期，第 44 頁。

6 陳明娥：《20 世紀的敦煌變文語言研究》，見《敦煌學輯刊》，2002 年，第 145 頁。陳明娥：《敦煌變文詞彙計量研究》，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5-7 頁。

7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 1997 年版，序第 1 頁。

三、本選題所採用的材料和研究體例

(一) 選用材料

選題必須要選擇材料、利用材料，經過相互比對和慎重考慮，本選題選用和利用的材料如下。

(1) 以中華書局 1997 年出版，黃征、張涌泉校注的《敦煌變文校注》為底本（簡稱校注），同時也參考《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新書》《敦煌變文集校議》《敦煌變文選注》等材料。

(2) 在考釋敦煌變文名物時，主要利用了傳世文獻，尤其是漢籍檢索 4 電子語料庫和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語料庫。另外我們有時還用到了《大正新修大藏經》2010 年電子版語料庫，不過筆者在引用資料和選擇例句時，都一一和原文進行了對照，力求將錯誤和失誤減少到最低。

(二) 研究體例

(1) 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總論，下編考釋。所列名物條下的例子均來自《敦煌變文校注》，所考釋的名物下皆用橫線畫出，括號內的數字表示該例句所在頁碼，以便查找核對。另外，正文中凡出自校注的例子均標明頁碼。

(2) 論文所引佛典均用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例句的後面一律加括號，“/”前後分別表示引句所在的冊數和頁數，a、b、c 分別表示上中下欄。

(3) 為行文簡潔，文中稱引前賢時修之處，皆直稱其名，不贅先生字樣，敬請海涵。

(4) 文後只列主要參考文獻和主要徵引文獻。

第一章 敦煌變文名物的研究價值

詞彙就像一個小窗戶，通過它可以熟悉一個民族的過去。詞彙中包括實詞和虛詞，“詞彙學的研究重點是實詞，因為有的虛詞詞彙意義已經弱化，有的甚至完全失去了詞彙意義，只剩下語法意義，所以它們主要是語法學研究的對象。”¹“漢語是以實詞為中心的，而實詞之中名詞最實，所以名詞可稱體詞，動詞和形容詞都是相詞，而動詞與形容詞對名詞而言，就都變成虛詞。即就這兩種虛詞來講，以動詞與形容詞相比，昔人還以形容詞為實詞，而以動詞為虛詞（見薛傳均《說文答問疏証》卷五）。這可見漢語的本質是不可能以動詞為重點的。”²趙元任說：“名詞是列不完的一類。一個語言中的語彙，大部分都是名詞。名詞不但比別的任何一種詞類多，甚至所有別的詞類加起來，也比不上名詞多。”³據呂叔湘（1963）、尹斌庸（1986）、劉傑（1990）、張彥昌等（1996）分別對《現代漢語常用三千詞表》、40000多個現代漢語通用詞、《普通話三千常用詞表》、《現代漢語頻率詞典》統計結果顯示，名詞占百分比分別為54%（3000個詞級）、56%（40000個詞級）、60.4%（3000個詞級）、39.5%（100個詞級占13%，300個詞級占24%，2000個詞級占39.5%），這是現代漢語名詞在詞類中所占的比例。

就漢語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中的名詞情況尹斌庸（1986）也作了統計，結果如下⁴：

時代 詞類	上古漢語	中古漢語	近古漢語	現代漢語
名詞	29%	29%	29%	28%
動詞	26%	25%	25%	23%

詞彙學研究的重點在實詞，實詞中名詞較實，而名詞中的名物又是名詞類別中意義最實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名物是詞彙學研究的一個重點，這樣的

1 張永言：《詞彙學簡論》，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1頁。

2 郭紹虞：《漢語詞組對漢語語法研究的重要性》，見《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學術專論）》，1978年第1期，第35頁。

3 參劉夢溪：《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趙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頁。

4 參尹斌庸：《漢語詞類的定量研究》，見《中國語文》，1986年第6期，第433-434頁。說明：上古語料以先秦散文為主，詩歌辭賦不收，抽樣11部著作或作者的文章；中古漢語以唐、北宋散文為主，抽樣唐代4位，北宋8位作者的文章；近古漢語以明清散文為主，抽樣明代12位，清代9位作者的文章。

說法並不為過。黃金貴根據語言反映文化的不平衡性把詞彙分爲通義詞和文化詞，並用統計的方法說明了二者的比例為 1：2，以前我們把注意力主要放在了這個 1 上，很少注意這個 2，所以當我們遇到某個不太理解的文化詞去查找字典、詞典時，列舉的義項往往是儲存態的意義，而運動態的詞義只能靠閱讀者去體會或者一知半解了。名物是文化詞語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同樣的道理，名物對於敦煌變文中的閱讀與理解、對於漢語詞彙史的研究、辭書的編纂與修訂等方面都有重要的研究價值，下面分而述之。

一、有助於變文的閱讀與理解

“在敦煌所發現的許多重要的中國文書裏，最重要的要算是‘變文’了”。¹如果僅從語言方面來說，“變文採用的是接近當時口語的文字，保存著大量的口語資料，它對於推究古今語音演變之軌跡，考索宋元白話之沿溯，都有著重大的參考價值。”²敦煌變文詞彙研究自蔣禮鴻始，學者們對其研究傾注了大量的熱情，作了許許多多的工作，不管是疑難詞考證還是俗語詞考釋，都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敦煌變文中含有大量的名物，然“古今時變，名物相應而變，或則同物而異名，或則同名而異物，又或朝代異制、方域有別，種種情況，幻如雲狗。故今人多感其形難考，義難明，較之普通語詞，更多疑惑”³。如在閱讀過程中，今人不知“樗蒲”“魚符”“魚袋”“皂蠹”等為何物。如果不知道實物是什麼樣的，那麼就不懂書本上所記載的事物，所以更談不上理解文意和體會其中用詞的奧妙了。

【樗蒲】

貪歡逐樂無時歇，打論樗蒲更不休。(970)

伴惡人，為惡迹，飲酒樗蒲難勸激。(978)

……飲酒樗蒲，姦非過失，帶累兄弟，惱亂耶娘。(997)

樗蒲或作擣蒲、擣蒲、擣薄；又名蒲戲（蒲戲），蒲博。《說文·木部》：“樗，木也。以其皮裹松脂。從木，雧聲。讀若華。櫓，或從隻。”徐鍇《繁傳》云樗為“今人書樺字”。段注樗作櫟：“櫟木也。從木，虍聲。讀若萼。”櫟樺古今字也。樺是華的俗體。依徐鍇和段注是樺樹。一般認為樗是臭椿，苦木科，落葉喬木，抗旱性較強，耐煙塵，生長快，為工礦區較合適的綠化樹之一。其材粗

1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插圖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48 頁。

2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中華書局 1997 年版，前言第 6 頁。

3 華夫：《中國古代名物大典》（序），濟南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 頁。

硬，不耐水濕。可供膠合板、建築、造紙用，根皮可入藥。不管檮是樺樹還是臭椿，總之它是一種樹木的名稱。《說文·艸部》：“蒲，水艸也。可以作席。”湯可敬《說文解字今釋》云：“蒲，又名香蒲，水生植物。莖和葉可編蓆、蒲包和扇子。嫩苗叫蒲菜，可吃。花粉稱蒲黃，可作止血藥。”¹看來檮、蒲合起來與作為具有娛樂和賭博性質的檮蒲沒什麼關係。蒲是“博”的音轉，博與“簿”通。所以，檮蒲即“檮簿”也。《說文·十部》：“博，大、通也，從十，從專。專，布也。”《說文·竹部》：“簿，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從竹，博聲。古者烏胄作簿。”檮簿是一種局戲，用具常用檮木做成，故稱“檮簿”（檮博、檮蒲）。

檮蒲的博具一般有：枰、杯、矢、馬、齒、籌等。枰，棋盤，以供行棋；杯，杯子，以供投擲；矢，箸，以供計算齒彩多少；馬，棋子，以供在棋盤上行走爭道；齒，博齒，用木塊組成，上面刻有盧雉等彩名；籌，賭注，即參與者下的賭物。馬融《檮蒲賦》云：“枰則素旃紫罽，出乎西鄰，緣以纘繡，綴以綺文。杯則瑤木之幹，出自昆山。矢則藍田之石，卞和所工，含精玉潤，不細不洪。馬則元犀象牙，是磋是礲。杯為上將，木為君副，齒為號令，馬為冀距，籌為策動，矢法卒數。于是芬葩貴戚，公侯之儔，坐華榱之高殿，臨激水之清流。排五木，散九齒，勒良馬，取道里。是以戰無常勝，時有逼逐。臨敵攘圍，事在將帥。見利電發，紛綸滂沸。精誠一叫，十盧九雉，磊落蹠踔，並來猥至。先名所射，應聲紛潰。勝貴歡悅，負者沈悴。”

檮蒲的玩法有簡和繁兩種：簡單的易操作，隨時隨地均可進行，適合下層社會的人群消遣和娛樂；而正規的檮蒲玩法比較繁複且講究，參加的人數可多達5人，適合中上層社會打發時光和消遣。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檮蒲的正規玩法基本與唐代的相同，比較明顯的區別是，以前是九種采，而《五木經》中所說為十種，究竟後者比前者增加了哪一種采，不得而知；到《唐國史補》時又有十二種采，即在十種采玩法的基礎上又新增加了兩種采：進（采筭九）、退（采筭六），如何增加，不詳。還有，《五木經》中的矢為120，《唐國史補》中有360。這些情況說明，當時檮蒲仍在不斷的發展變化。

博戲在我國起源很早，夏商周均有傳說，秦漢有實物與文獻，漢代達到了全盛時期，以後歷代屢禁屢有，且花樣翻新，不一而足：先秦的六博，秦漢興起的格五，魏晉南北朝盛行的檮蒲，隋唐流行的雙陸，宋元的打馬、鬪促織，明代的馬吊、清代的麻將、彩票，民國的跑馬、撲克等，一代有一代之遊戲、娛樂、消遣，既有所繼承，又有所發展。目前為止，考古中發現較早的博局實

¹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今釋》，岳麓書社2002年版，第82-83頁。

